

文史資料選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三十七輯

一个外国人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美)胡伯特·费瑞恩著 朱启明译

我的自述 陈此生

战后对日索赔工作与光华寮案 周锡卿

傅惜华与碧藻馆藏书 傅耕野

程砚秋集锦扇记 翁偶虹

京剧艺术在美国之发展 徐英

北京出版社

文史資料选編

第三十七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编

Wenshi Ziliao Xuanbian

第三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70000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50

ISBN 7—200—00851—6 /K·83

定 价：3.75元

说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本书中非法定计量单位应改为法定计量单位。其中：1斤=500克；1里=500米；1丈=10尺=100寸=0.333米；1英寸=0.083英尺=0.0254米；1石=50千克。

编 者

1989年6月

文史资料选编 第三十七辑 目 录

一个外国人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 (美) 胡伯特·费瑞恩著 朱启明译 (1)

我的自述 陈此生 (63)

珍珠港事变后回到桂林的日记 陈此生 (71)

何香凝画菊图题跋 马叙伦 茅 盾等 (92)

清末民初的军官学校 彭 明 (99)

战后对日索赔工作与光华察案 周锡卿 (115)

国民党空军的建立与发展 赵 新 (123)

少年时期的老舍 刘澄清 (130)

《五月的鲜花》曲作者阎述诗二三事 白 仑 (134)

爱国职业教育家费起鹤的一生 费路路 (138)

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家

——缅怀贝满女中管叶羽校长 黄亦平 李爽麟 (150)

- 忆我的老师姜文熙教授 范日新(168)
- 存素堂丝绣散记 朱海北(174)
- 一息斋记 朱启钤(178)
- 傅惜华与碧藻馆藏书 傅耕野(182)
- 李烈钧在中山先生逝世前后 杨仲子(197)
- 剧坛鸿爪录 (四) 翁偶虹(203)
- 京剧艺术在美国之发展 徐 英(208)
- 北京早期电影业和一个电影放映世家 ... 侯希三(215)
- 八国联军进京见闻录 齐如山 遗稿(230)
- 旧卫生部组织的变迁 傅 惠 邓宗禹(253)
- 蜡库旧事 李梦黑(278)

一个外国人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美) 胡伯特·费瑞恩 著
朱启明 译

编者按：胡伯特·费瑞恩(Hubert Freyn)，1935年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到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国戏剧。是年冬，他在“一二·九”运动巨浪的冲击下，毅然放弃了“局外人”的处境，以一名燕大同学的身份，参加了“一二·一六”、“南下扩大宣传团”、“三·三一”和“六·一三”等活动。1939年，他就这段经历，并参考中外报刊杂志资料，写成了一本11万多字，共分6章的著作，全面记述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国的开展情况。书名为《战争的前奏》(《PRELUDE TO WAR》)，副标题为“1935—1936年中国的学运”(“The Chinese Student Rebellion of 1935—1936”)。并于1940年由上海中国时事发行公司出版。

此书英文原版，迄今所知，留传下来很少了。本书为雷洁琼教授所保存，是作者亲自签名赠给严景耀教授的。在此书残旧的扉页上印有“献给1935—1936年冬春学期我的燕大同学们”。此外，还有作者亲笔书写的：“献给严景耀博士，用以怀念曾在燕京度过的时光。”

此书最近由朱启明同志（他是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燕大学生）译成了中文。现将该书的序言和第一、三、四等章节略经删节登载如下。本文大小标题均为编者所拟。

序　　言

为了继续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特别是戏剧（这是我曾经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攻读过的课题），我于1935年9月来到北平。当时，我身居燕京大学，面对一派可以饱览这座古城丰富遗产的，明媚有趣而又魅力无穷的前景，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呈现出好兆头，深信自己即将进入一个充满学术气氛的年头。当然，对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日关系，我不会毫无感觉，但我并不觉得会发生什么波及我个人生活的事件，总以为不平静、干扰都难免发生，也将是微不足道的。我所在的新环境把我完全迷住了。它使我对政治之类的讨厌题目不屑一顾，连报纸也不耐烦看。就在我沉醉于幸福的无知之中时，政治地平线上却早已经出现了多种险情。

当时，我尽情地享受燕京校园里，以及西山、长城等其他一些初访者必游的名胜古迹的美景。当我逐渐与人结识时，我的同屋，使我能够十分近便地对中国大学生进行细致观察。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被当时的实际处境和未来前途如何所干扰。我对什么是大多数同学所忧心忡忡的事情毫无察觉；表面上，一切都那么恬静、和平，作为局外人，我无缘窥见那惬意的

日常生活背后真正的底蕴。

我终于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一下子被“一二·九”运动所抓住了。事前，对眼皮底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论我的同屋还是其他人，都从来没有给我过片言只语的暗示。那天清晨，我一觉醒来，就发现我的同屋不知去向了，其他许多学生也都不见了。尽管有的教授曾听到传说，学生们正在计划着有所行动，但大多数教职员们都对此感到突然。

当天，我除了等待游行的人从城里回来外，无所事事，就到图书馆里翻阅华北的旧报纸。从报上窥见的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一些端倪，使我了解了当时的形势和眼前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意识到学生们的行动关系重大。而这，就是我曾在书本上读到过的，近代中国时常发生的学生运动！现在，我已身临其境，有可能目睹这一切了！

当一群群游行的人们相继返校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大家又乏，又饿，情绪有些沮丧。我的同屋也是如此。这倒把我因自己被蒙在鼓里而激起的一肚子火平息下去了。我的同屋在诅咒了一阵之后，向我讲了他们一天的经历。从这时起，我下定决心，下次一定亲自参加。

我的“田园诗”就此完结了。中国戏剧突然变得兴味索然，无足轻重。在短短的12小时内，平安、恬静、使人忘怀一切的气氛一扫而光。大地面貌依旧，但显得阴沉忧郁，以往战争的阴霾重新出现。人人都在紧张地期待着，灾难似乎正在迫近，人们好像已经听到远处那隆隆的炮声。

从“一二·一六”开始，我再也不是一个局外人了——没有这个转变，这本书就无由写成。

我成了“哥儿们”。其实，基本上是个“老弟”。那些小伙子们时刻把我挂在心上，自认为要对我的安危和健康负责。于是，我就确实成了个比他们年长一倍的“小老弟”，一切行动都听命于他们。在我需要帮助，而他们又力所不及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做出同情、热心和毫不含糊的人道主义的表示。

值此关键时刻，我所得到的友谊，是否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我的前任系主任去判断。我本人对这次重大转变从不后悔。相反，在这段奇特而又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有那么多人一直和我在一起，给我诚挚的友情，我对他们是非常感激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据我所知，现在已经分布在全国各地，终于能够实践自己的爱国热忱了。为了迎接光明的未来，他们正在战斗。在这里，我对他们谨致最良好的祝愿！

H·费瑞恩

1939年8月9日于上海

美丽而恬静的燕园^①

学年伊始，中国各地许多青年男女为接受高等教育，来到位于古都西北郊的燕京大学。学生中，有半数以上来自靠近广州的亚热带各省；有一些来自长江流域；还有一些家居内地；其余的一小部分就住在这座帝都内，距学校只有半小时的公共汽车路程。各地学生总计840余名，其中830名是本科生，394名一年级新生；按性别分，男生610名，女生274名。

^① 此节为原书第一章。

翻开校园报纸，其中不乏激动人心的标题：“本届新生异常活跃，示威反对二年级生搞‘拖尸’”^①、“本学期注册人数破记录，宿舍紧张，令人烦恼”，等等。这座美国人办的中国大学究竟“美国化”到什么程度？在下结论前，先让我们在校园里走一圈。

我们首先来到微风吹拂着的湖畔。这里建有二十四五座美丽的建筑。其外型是中式的，有拱起的大屋顶和精美的雕梁画栋。这是一位美国建筑家设计的，他为了把中、西两种迥然不同的传统建筑风格协调起来，做了这次大规模的“内西外中”的实验。离开湖畔，就进入了风景如画的、开阔的公园，园里有若干坚固、新颖，但又不陌生的平房，旁边是网球场。水塔隐藏在一座中国式的塔里，它后面有个操场；电话和电灯线沿校园的主干路并行。湖边绿柳成荫，只是那支大烟筒在这美景中显得很不协调。

我们多少有些失望：“这不过是一座中式包装的西方大学。”看来，为睹其“庐山真面目”，我们还须做一番努力。跨过一座小溪上的白石桥，我们来到男生宿舍，一共6所。只见门前存放着许多自行车；这里的学生谁也没有汽车。在北平，汽车属于将军、大使和财主们，学生进城，只能乘坐大轿车。

步入宿舍，我们面对的不是豪华的厅堂，而是狭长的、光线不怎么充足的、石铺地面的走道；两旁各有若干排着号码的房间，房门上嵌有写着两个名字的卡片。唯一不嵌卡片的是大门左边的第一个房间。通过敞开的门，只见三名身着黑色仆人装的中年人，坐在桌旁。他们是服务员，一旦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斋夫”的喊叫，他们三人之一就得起立应命。这就是住在学生宿舍

^① 拖尸，英文toss。是从美国大学传来的一种陋习，由二年级学生对一年级新生搞恶作剧。

里的仆人。

我们进入一个房间，迎面窗户下摆着一张桌子，两位身穿学生装（蓝布大褂）的青年，在桌子的两侧对坐，他们从粗糙的椅子上站起来，鞠躬说道：“请坐。”

为了不干扰他们，我们走进了另一个房间，那里没人。房间里有两张中国式的硬板床，床上有简单的被褥。室内还有木制的立柜和衣橱各一个，两个洗脸盆，若干块钉在墙上的木板（当书架用）和一盏电灯。地是水磨石的。粉白的墙壁由住者根据自己的爱好装饰。没有窗帘、地毯和软椅或其他供人享受的舒适家具。生活是简朴的，但又不是“斯巴达”式的。这种简朴生活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由家庭传统带来的。在中国，做父母的无论贫富，都认为对子女不应该娇养，至少在物质生活上是如此。学生们把书籍、纸张和衣物随便乱丢，很少有人想搞整齐。宿舍中这种放荡不羁的现象也表现在一些男生的外表上，他们在校园中漫步，透过他们心灵的窗口，可以看出他们好像只有一条规则——安适。

最近从报端得知，有个美国学生因穿短裤上课，在休斯敦和得克萨斯被某学院开除了。照此标准，燕大的学生怕有25%得走人。这个校园就像一座庭院，人们在夏天只消穿点汗衫之类的东西遮体就行了。上课时，人们也穿短袖衬衫，通常是穿长裤，偶尔也戴一条领带；运动场上，人们穿短裤、运动衫、运动鞋；在饭厅里就更随便了，男生可以只穿两块极为简单的东西，如果天气过于炎热，上面的一块还可以省掉，所有这一切都很自然。因为，这些男生是在“家”里，是和自己人在一起。尽管外人，包括异性并不禁止入内，但异性入内的情况极少出现。很多人穿中式长袍，它能把舒适与色调的变化合为一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显得庄重，进城时穿特别适合。进城意味着要装扮起来，中、西式都行。在冬天，本乡本土的大棉袍能和各种皮夹克、西裤以及形形色色的毛衣和围巾相竞争。毫无疑问，中国人是个人主义者。

让我们继续宿舍中的巡礼。在有50名学生居住的每层楼里都有一间浴室，装有4个浴盆，8个喷头。全楼没有可供浏览的厅堂，没有可以供人斜靠一下的地方。

与宿舍相连的饭厅也显得同样简陋。饭厅是一座高大的屋子，里面有几十张方桌，每桌配有4个没有靠背的凳子，桌上没有中国传统的银器皿，只有4双红色木筷子和瓷器汤匙。没有咖啡间。日常正餐每桌是四菜一汤，由仆人送上桌，菜中有肉和蔬菜，馒头、米饭自取，管够。不备饮水用的杯子（尽管在校园中有未经煮沸的水可供饮用），也没有茶。早、午餐一般用一刻钟就能吃完，晚餐稍多费一点时间。学生们吃饭时并不围桌而坐，或边吸烟边谈天，他们常常是口中嚼着最后一口饭菜就奔向寝室、教室、图书馆或实验室了。

他们为什么如此匆匆忙忙，只要看看他们的课程表，一切都清楚了。上课时间每周从16节到30节，一二年级学生还要上两小时的军训和体育必修课。和美国一样，每节课的课外作业要求是两小时。这样紧张的生活不是出于经济压力。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这所大学被认为是奢侈的，有点像美国的哈佛，来此就学的人，一般至少是小康之家的子女。尽管如此，那种整天玩个没够的纨绔子弟，在这里却很难找到。我问过一位中国教授，对他的学生作何评论，他说：“他们学习太多，体育锻炼不足。”

学生们在艰苦攻读之余，也有一定的消遣。打网球，踢足球，溜冰，是调济校园生活的主要花样；吸烟、跳舞、放荡的茶

会和酗酒根本没有。娱乐的高峰仅仅是周末进城看一场电影。

中国学生到大学来只是为了读书，传统的治学之道原封未动。

为了说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外表的区别，不妨再举几例。一位一年级新生拿来一篇英文作文请我修改，那是一篇描写教室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语句：“在教室里，我最喜欢的是和气的教师和同学们那些斯文的面孔。”我不想说，所有的中国大学生都会这么写，可是，除了远东外，其他地区的大学生谁会这么写呢？“同学们斯文的面孔”，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提示。当你在校园观察人们千姿百态的面孔时，你可以注意到，在美国大学里难得一见而在这里却是人所共有的一个特征：一副文质彬彬的表情。这是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标记。中国艺术即便在它最现实主义的阶段，也从来不是粗糙的，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本身就是文雅的。这种文质彬彬的气质，是一种经过数千年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民族特征。在美国学生看来，他们似乎缺乏好斗习性。这里的足球运动在美国人看来也过于温和；橄榄球流行不了，因为它被看做是过分野蛮、粗鲁的运动。校际运动竞赛虽然仿效西方，每学期举办一次，但从来不像在美国那样广泛，也不可能在群众中掀起狂热。学生们对这类活动是会有议论的，我从没遇到过一位成人对体育比赛特别关心。中国人太敏感了，看对抗性太强的表演是不会觉得太愉快的。

中国的学生们相当耐寒，室内气温保持在华氏60度（15摄氏度左右），这对西方学生来说是不舒服的。对声和光，他们也显得迟钝，打字机的砰砰声无碍同屋入睡。寝室电灯每晚靠定时拉总闸才能熄灭，而大家却都有本事在亮光下睡觉，谁也不管关灯。

尽管如此，他们到底还是十分敏感的，许多男孩子的整个身体就像是由一捆神经组成的。他们的动作、姿势、眼神、语调（如果不是出于礼貌的原因自我克制的话）时时透露出一种高傲的、感情丰富的、有时神经过敏的气质。这种气质在来自南方的学生中尤为明显。他们的体魄、耐力一般都不强，打网球两局就够受的。可是他们的脑力劳动能力却十分了不起。只就许多课程必须用一门外语来学这一点，就足够使我深思了。有谁能想像一个美国高中毕业生，能使用法语学好大学课程呢？尽管中国学生在中学都读了 6 年英语，可是英语和汉语间的差异，比起法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不是大得更多吗？

我的那位教授说得对：学生们确实很努力学习。他们花在学习上的精力，如果不是过多，至少也是很多的。于是，学生对教师的要求就严格起来了。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开学两个月后，有个一年级新生抱怨地对我说：“有些讲师不配在这儿教书。”听他的口气，不像是自以为是、吹牛，而确实是很烦恼、失望。

西方文化朝中国丢过去，落下来，单是为了自卫，学生们也必须抓住它。这使他们的脑神经处于危险的高度紧张状态，但别无其他选择。3000年的古老文化传统和咄咄逼人的现代化世界，这两方面的知识都必须设法接受。同时在两方面出击，会使一些学生，特别是那些身体欠佳的学生产生情绪上的不稳定，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像中国最负盛名的小说《红楼梦》中所刻画的那种男青年：一旦过于兴奋，就会痰中带血，喝一口酒也会面红耳赤。他们的生理器官过于纤细，一点点精神上的震动，就会产生身体上的失调。他们的健康状况是好的，但经过两年必修体育课的锻炼，经医生体检依然只得“弱”的，也不是

个别人。他们的身体不够强健，他们自己也知道。在别的地方，我从没见过有那么多的鱼肝油瓶堆在饭厅里。

在他们面前，学业如此繁重，而救国大任又责无旁贷，他们只有下决心把每一点精力都贡献给那灾难深重的祖国。这种精神所产生的效果，有时是十分感人的。

体育锻炼对于他们，有时并非由于兴趣，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必须强壮起来，必须要多锻炼”，这种话我听到过多次。当他们把自己和那些结实、强韧、恬静而又招人敬爱的农民和工人相比较的时候，常常流露出一些“忌妒”之情。“你看那些普通人，多么了不起！不是吗？”说话的是一个青年。他身材修长，两只眼睛又黑又深，喜欢深思冥想，有时若痴若狂。尽管他已经18岁了，可还是个孩子。

他们之间经常激烈地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在教室里却经常沉默。在饭厅比较放任。当食物未能及时供应时，盘、碗、汤匙就乒乓乓地敲起来，这类事情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发生。有些学生努力克制自己，另一些则不觉得对仆人也必须有所检点。

切莫误解，我描述这些敏感的年轻人，无意要说一切中国学生都有点神经反常，而是要说与西方大学相比，这里这种类型的学生要多得多。一般地说，这儿实际上没有粗壮男子汉的典型。中国种族温良、文雅类型的人多于活泼、健康类型的人。与这种生理状况相应的，则是某种迅速反映和易变的气质。这在那些南方人身上尤为明显。挑个准确的词儿，应该说他们是“艺术化”的。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绘画、诗歌方面具有智慧或天才，诗歌往往会在他们的心中自然地涌出。这些男孩子们的表现，一向被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典型反应，即文雅的气质，内省的趋向和对艺

术的根深蒂固的酷爱。

人们可能想到，具有以上特征的人，身处在到处都要斗争的现代世界里是不会舒服的。因为到处都会使他们悲观失望，未来也并不是玫瑰色的。中国是外敌入侵的牺牲品，也是经济危机的牺牲品。我想不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处境更坏，也想不出哪个国家的学生比中国学生的处境更坏。有统计数字说明，中国大学毕业生能有就业机会的不过2/7。我不知道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加前途渺茫。这里的男孩有自己的忧愁，但周围的暗淡景象并不足以抑制住他们的生机。悲观主义的哲学和他们无关。读者也许会说，那是由于他们还年轻啊。可是，身处我们这样的乱世，感到悲观失望、活着没味，是并不需要多大年纪的。原来，还有一个民族特征在对中国学生起作用。我们记得，中国的哲学家从未倡导过悲观主义，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人的气质基本上是属于乐天派的。

尽管他们性格内向，但神志清醒，没有深陷入人类意识的歧途。外界给他们以剧烈的震撼，他们依然有足够的轻松心情，使自己不沉溺于愁思和怨恨甚至无法自拔；尽管愁思和怨恨难免有之，但决不会持久。

一般美国学生要使自己浪漫起来，首先得恋爱，然后才能变得敏感。可是，中国学生的敏感性几乎是先天就有的。他们对美的欣赏是出自本能的。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宿舍里摆些花草，即便是一间颇不整洁的寝室。他们对满天的繁星，西山的落日，多姿的树木和斑斓的鸟雀等大自然所表现出的现象都能感受。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装点，而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朋友们的这种气质，使我得以和他们进行有关文学艺术的